

〔结语〕

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

当女性情欲解放的论述开始出现，并且以具体可行的实践纲领（如打破处女情结、反性骚扰、反婚姻性暴力、要求爱抚与高潮等等），以及从女性主体本位所生产的论述活动（如女性情欲DIY小说、出匭文学式的『妖言』、女同性恋的『爱报』、性心情的小组分享等等），来推动女性的情欲解放时，关心妇女运动的人也开始思考一些和运动相关的问题。

女性的情欲自主是否只是个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间或零星的小团体中进行的暗爽活动？这种情欲解放于强大的父权体制何干？个人的性开放早就时有耳闻，但是也没见到什么干扰父权体制的果效，到底情欲解放不能算是一个运动？更正确的说，能不能成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其他阵线（如改革立法、工作平权等）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让我从父权体制和女性的『性』之间的权力关系说起。

父权体制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対『性』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与性压抑共生共谋。我们文化中的性控制具体的体现在整套的日常生活实践、性论述的生产与扩散、有关性和情欲的仪式与价值观、对违规者的惩罚和放逐措施、性教育和性医学的权威等等文化成分中。这些规范性事、维持性秩序的措施主要执行两方面的社会控制：

第一方面，父权制必须规范男性与女性各自的独特文化分野和运作领域（男强女弱、男色女纯、男外女内、男公女私等），并且规范两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行为模式、人格特质，以

便强化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权力差距。

另一方面，父权制也对『性』及其相关活动加以规范，任何与生殖无关，或是在异性恋、一夫一妻婚姻之外的『性』都被视为违法的、不正当的、不正常的、恋态的。

换句话说，性不是情欲或人际关系而已；性是被权力关系彻底渗透的。

在性压抑的社会中，性控制的各种规范是同时施加在两性身上的，但是，在性压抑和父权制互相渗透的状况下，这些性规范显然是对女性特别不利的。

我们可以用两个实例来说明。由于我们这个社会的避孕观念不开放，避孕知识和设施不流通，因此『可能会怀孕』变成女人的心头重担，迫使她们在性事中思前想后，终至裹足不前。但是同样的避孕观念不开放，避孕知识不流通，对男人而言却没有那么重大的影响。可见，父权文化对性及其相关硬体软体设施的提供及规范，本身便包含了性别歧视以及两性权力差距。

再说另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女人如果违犯了我们社会的性规范（如婚前性行为、未婚生子、同时有好几个性伴侣、外遇等），就会遭受严厉的社会制裁。可是同样触犯这些规范的男人即不会承受相同压力。几时听过男人为婚前失身而遭妻子不齿？几时听过男人因未婚时使女人生子而羞于见人终至遁世隐居？几时听过男人因为女友很多而被骂淫贱？几时听过男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容忍太太外遇，自己则饮泣终日，哀怨悲痛？依此来看，我们社会对

性活动的规范绝对是歧视女性的。

为了对抗父权制和性压抑联手加在女人身上的诸多权力运作，女人的情欲人权因此可以很具体的表达为：女人有权自由的表现表达她的性需要(而不必因名节或被动或性恐吓而压抑自己)，她有权只为愉悦而进行性行为(而非动物式的为生殖而性，或被迫为婚姻而性)，她有权在婚姻之外参与性活动并且生育(而非此身仅属一人，她在愉悦成长中生育的孩子也不可被视为『杂种』)，她有权控制自己的生育权(而非子宫由传夫宗接夫代的过时道德所操纵)，她有权拒绝和某男人或所有的男人发生性行为(只要我不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她更有权维持她的女同性恋身分认同等等。

一旦我们在同时对抗父权制度和性压抑的脉络中思考女人的情欲人权时，我们立刻发现一般人所使用的运动口号——『情欲自主』或『性自主』——其实并不理想。『情欲自主』(『性自主』)是个两面讨好、充满自由主义式浪漫情怀的口号，可是如果这个名词只有一个听来美好，充满正义感的模糊情绪做为内容，那么，它也可能被我们习以为需的、不知不觉的在父权制度内养成的道德及价值观所渗透，以至于这种『情欲自主』在具体实践上有可能并不促进情欲的发展和流动，也不挑战父权体制现有的两性关系，而只是增强了女人讨价还价时的价码(『我情欲自主，所以我不轻易许人；我维持清纯，因此我应该可以比较好的男人交易』)。这种抽象的『情欲自主』更可能增强性压抑的女人的压抑，巩固她们一买对男人的性

追求所抱持的恐惧和怨恨心理（『男人没一个好的，都只是垂涎女人的身体，利用女人而已；我情欲自主，因此，我不甩男人』）。『情欲自主』这个听来相当正面的口号还有可能提供一个听来有前瞻象征的装饰给故作开明的性压抑女人，让性压抑的女人用它来掩盖自己在社会开放过程中逐渐暴露的保守底线。

由于『情欲自主』这个口号十分温和正面，所以它很容易被以暗爽为主的思考模式所诠释。就像坊间出版的一些有关女人和性感的教战手册，它们以轻松自然的语调提供许多指示或暗示，教导女人如何享受身体和情欲，并且可以号称『情欲自主』，但是整个论述却仍架设在父权制的情欲道德之上，以至于书中的描述总是说『你和丈夫』可以尝试什么新的游戏，『你和男友』应如何营造气氛，『处女』应如何预备迎接『新婚的第一夜』等等。这些追求愉悦的指示并不挑战父权体制，而只不过在父权体制规范的情欲轨道中为女性提供一些暗爽、小爽的方法而已。还有一些消费式的『情欲自主』广告影像，虽然描绘了违反父权道德的（例如）外遇、同居等等，但是这些广告所建议的出路竟然是一些减肥瘦身的计画或是美丽迷人的衣饰。这些『情欲自主』的诠释在某些程度上松动了父权制度内的女性规范，但是代之以资本主义商品的消费与逻辑，对于女性的终极解放和两性权力关系的改造都只是『有限暗爽』，因而也只有暧昧的效果。

换句话说，正因为『情欲自主』是个两面讨好、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概念，所以它有可能

被填入一些与性压抑和父权体制(及其同谋的资本主义体制)合流的东西。而我们如果希望女性的性欲运动维持解放的、打破原有体制的力量,那么,前列的性欲人权内容就需要一个具有边缘性格、旗帜鲜明,摆明了彻底挑战性压抑和父权制度的抗争符号。

在这里,我觉得『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是一个颇为有力的选择,因为它听来比较边缘激进,而『解放』也是社会运动常用的字。此外,它明确的宣示了同时在两个战场上的抗争立场:这个性欲运动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抗父权体制的两性不平等安排,特别是针对父权体制在性控制方面加诸女性的过度压抑;而在性欲解放的战场上,这个运动不但对抗一般的性压抑,更揭露在性压抑中所蕴涵的两性不平等。

换言之,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要做的是,切断性压抑和父权体制两者之间的利益输送,在寻求性解放的过程中同时寻求性别解放。

有许多人或许对性别解放(即两性平等)没有太多微词,但是听到『性解放』的时候就有点不豫之色。对这些人而言,性解放代表性开放、性自由,因此代表『乱来』、『乱搞』,像这样的私密活动如何能在集体的层次上达成改造社会的正面功效呢?

我们姑且不讨论这个问题的问法是否不自觉的假设了(父权)体制的稳定有某种优先考量中的地位——我们真的需要想想,对哪种秩序、哪个位置上的人而言,性自由会被视为『乱』?相对应于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方式,性解放会被视为有『负面』的功效?——不过,对性解放

的疑虑仍然值得我再加说明。

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首要的就是一个充满解放活力的论述实践运动。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提升女性愉悦、开发女性身体、充实女性情欲、解放女性性爱，同时强力挑战并搅扰父权体制的抗争论述实践运动，是一个看清了愉悦与权力有共生关系的解放运动。

更具体的说，这里所说的论述不但包括生产像本书这样剖析情欲文化、批判父权制度和性压抑的论述；也包含女人在集体中交换各种『出动的』性经验和性感受，以累积并流通女性的情欲资源；更包含女人由主体位置出发来创造『变态的』性幻想、情欲故事、情欲脚本等等女性的情欲文学（对『变态』的理解请看第四章）；或许还包含女人在各种性活动过程中激升情欲时，自主的创造『既浪且骚的』爽言爽语，包括女人在性活动前后和对手进行的情欲权力关系反省和检讨，包括在平日随时随地主动搜集并创造各式情欲刺激，讨论如何更爽更好玩等等。当然，这些论述和女性主义性解放社群动员网路的建立、次文化的形成、情欲人权议题的示威或活动、女性主义色情言论的自由、女同性恋的正当性、自由展露女性身体的权利、以及捍卫『性少数』（各种各样的性『变态』）的人权等等是密不可分的。

以此来看，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论述在父权制度和性压抑的社会脉络中必然是『离(父)经叛(夫)道』的，必然是『败坏(父权)道德』的。

长久以来，女人的性活动和性生活总是被父权体制和性压抑的逻辑所规范的，连女人赖以营造有限快感的情欲资源也充斥着这个非女性本位的逻辑。如果我们现在要发展以女性为本位出发的情欲文化和性活动，当然要冲破父权的文化和道德逻辑，而且愈是被指责，我们就愈清楚意识到这个解放运动的效果。

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论述因此必然是出国的。它不但溢出父权体制为女性身体和情欲规划的『轨道』（爱情、婚姻、生育），同时也欢欣鼓舞的庆贺女性同性恋情欲『出柜』，走出黑暗封闭的孤绝空间。

女性主义的性解放因此也必然是『变态的』。如果说我们社会中『正常』的情欲模式和资源是在性压抑和父权制的框架中形成，带着扭曲僵化的烙印，那么，冲破禁忌，充满情欲波动的女性性经验和性实验自然也会被称为『变态的』。如果说我们社会中『正常』的情欲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中才存在，那么，从女性主体位置出发突破父权规范的情欲关系（比方说在对象上从陌生到师生到女生到众生到畜生到别人的先生到……）就必然会被称为『变态的』。

或许有人会不死心的问：坊间已有不少大师小师们的性论述出版，媒体上也有各种形式的性教育和性讨论，看来性已经是个颇具正当性的话题，你说的论述和这些论述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大着呢！除了我前面说过的差异之外，做为同时反对父权体制和性压抑的论述，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论述目标是父权体制的瓦解和性压抑的崩溃。因此在解放的论述中不会有权威的、道德的、平和的声音来规范情欲轨迹，只会有每个个人情欲的欢愉所发出的自在呼喊；不会有正常的、正当的、正确的指标出来安抚追求安全感的心，只会有无穷的、『变态的』、『玩的』、多样的创意来激励压抑过度的欲；不会有孤立的、无抗争立场的模糊信息与商品文化勾搭，只会在和父权对立的位置上与妇运的其他战线联手，拆去压抑而且打击女人的一切社会建制。

不过，我也必须提醒一声，父权体制和资本主义商品文化在收编边缘论述的手法和速度上都是惊人的。任何时候我们所创出的论述抗争策略都可能被『消毒』后转为体制消费的对象，一旦边缘的说法被资本逻辑拿去和商品的象征内容串连起来（比方说，用女性情欲论述的自在能量来推销减肥计画、化妆品、衣饰等等），立刻便会削减女性解放论述本来的颠覆效应。

因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性解放论述只有且战且走，突击突围，不断开发那些被父权和性压抑所排挤的情欲成分，串连那些被视为不入（主）流、不合（父）理、不中庸、不节制、不正派、不伦的孤立声音，以测试父权体制收编企图之底线。毕竟，这些边缘的『脏东西』正是因为不合父权逻辑才被发配到边缘，变成『不XX的』，和它们的联结可以帮助我们自

不至于和父权体制同流。

对女性主义的性解放仍然抱持怀疑的人提出另一套质疑。他们说，这种情欲运动有很强的中产知识色彩，对基层的劳动妇女或更底层的原住民女性缺乏吸引力，而且也解决不了这些弱勢妇女所承受的最主要压迫——即政治经济方面的压迫。怀疑者因此质疑性解放做为运动策略是否明智。

这个质疑建立在一个很基本的假设上：基层劳动（特别是乡村）妇女没有情欲方面的问题，因此性解放的论述对她们而言缺乏吸引力。另外一个常见的类似说法是：老年人没有情欲方面的问题，所以性解放运动与他们无关。

可畏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因为，基层劳动妇女或老人不但有严重的情欲问题，而且他们的弱势位置使得这情欲问题更加严重，更加没有出路。

或许有人天真的以为情欲是中产有闲阶级的奢侈享受。这样想的人大概不知道机车钥匙俱乐部是在年轻的基层劳工中间发起的，像这样全凭运气摸钥匙配对出游，甚至上床，恐怕不是一向凭着性压抑才专心读书工作向上的中产阶级能想出来的。如果这个中产人肯去读读基层劳工爱读的交友及偶像杂志，他也会发现这些杂志中的疑难杂症信箱充斥着基层青少年男女的性活动和情欲困扰。各种迹象都显示，基层劳工之间的情欲活动绝不少于中产知识阶级，说不定还比这些性压抑的后者更频繁剧烈。

情欲活动的频繁剧烈并不表示情欲活动的品质一定也很理想。事实上，基层劳动女性的情欲发展严重地受到她们的阶级位置的局限，也就是说，她们的政经弱势处处压抑她们的情欲流动。她们欣赏的喜欢的情欲对象多半不屑她们的阶级成分，因此在情欲活动中也多采用掠夺的模式；交友约会的空间及活动形式在日益商品化、精致化的趋势中悄悄移出她们的经济能力之外；她们的情欲环境中充斥着粗糙的，以暴力和蹂躏为愉悦的色情材料；言词上的拙朴使得她们在情欲活动中无力捕捉自己的感受与挫折，也无言与伴侣沟通或谈判情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她们通当面对的、同属基层的性伴侣，也在类似的文化条件下成长，情欲生活的品质当然严重受到限制。

比起这些基层的少女来，基层的成年妇女的情欲处境就更困难了。她们绝大部分没有能力享有中产知识妇女晚婚或不婚的奢侈权利，反而多半很早进入婚姻关系，也很快就被迫把性和生殖等同起来，在绕膝成群的孩子及永无休止的家庭经济活动中枯竭她们的情欲。她们和基层少女一般面对着劣质的情欲文化条件，但是由于她们是已婚的，是在尚未建立情欲谈判模式前便被塞入父权家庭的，因此，她们更没有出路，更无发展机会。在基层阶级『家庭即经济单位』的主导模式之内，妇女的情欲人权无地可容。

改善基层妇女的政经人权固然重要，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她们在情欲人权上的极端弱势。我们不能像中共那样，推说『肚子都吃不饱了，还管什么人权？』，这种心态反映

的是对基层妇女情欲困境的轻蔑。

父权体制对女性的压迫在各层面都有，而且彼此互相支持，我们的反击也必须全面展开，因此，我们应当抛弃政经优先论或『阶段论』（即，先要取得政经人权，才能谈情欲人权）的想法。不谈情欲人权的争取政经人权运动，很容易变成一个性压抑的、性保守的、主流的运动，而终究难逃被国家机器收编的命运。当然，另一方面，要抵抗父权体制对女性的性控制，情欲人权也必须和政经人权齐头并进。

同样的论证可以应用在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其他层面之间的关系。在号召女性主体起来反抗父权体制的抗争中，没有任何战线享有优先或重要的特权地位，要彻底推倒父权就要把支持父权的其他制度（如性压抑）一齐推倒。

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正在开展：在女性开发情欲论述的过程中，我们也正在重塑我们的新主体。让我们都来做——

豪爽女人